

霍斐然先生《周易正解》序

中华民族在世界的东方繁衍生息，于数十万年之间形成自己独具特色的礼乐文化。大约在一万年前，进入新石器时代母系氏族公社的原始社会，于是“龙的文明”出现于东方。“龙的文明”是一种原生态的道学文明，发源于母系氏族公社时期的原始宗教，以图腾崇拜、自然崇拜、生殖崇拜、女性崇拜、祖先崇拜为特点。因其“图腾崇拜”，故能汇诸部落之图腾而成一龙图腾，乾坤“未离其类”，“故称龙焉”。因其“自然崇拜”，故能“道法自然”，与天地共生，与万物为一。因其“生殖崇拜”，故能生生不已，化化长存，新新不停，穷通变久，而成易道。因其“女性崇拜”，故能守中致和，以柔克刚，知荣守辱，以弱胜强，曰“慈”、曰“俭”、曰“不敢为天下先”。因其“祖先崇拜”，故能天人合德，攸久无疆，“子孙以祭祀不绝”。夏、商、周三代时期，洪水滔天，先民于治水之际而父权上升，母系氏族公社的原始社会逐渐解体，至周代父系氏族阶级社会的原始儒学文明遂代道学文明而兴。周公制礼作乐，进行了一次原始宗教革命，将原始道学的自然礼乐文化演变为儒学有贵贱差等的政治礼乐文化，“祖先崇拜”被强化为父权家长制的家族统治。易道亦由《连山》而《归藏》而《周易》，作为中国诸子百家之学的源头保存下来。

中华文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达五千年之久，此五千年传统文化之学术谓之国学，欲治国学必先研究先民遗留下的原始经典。这些元典有五部，即《周易》、《尚书》、《诗经》、《礼记》、《春秋》。《周易》为先民原始宗教的文化遗存，是中国哲学的元典。此外，《尚书》为中国政治学的元典，《诗经》为中国文学的元典，《礼记》为中国伦理学和社会民俗学的元典，《春秋》为中国历史学的元典。据云中国的元典除此五经之外，尚有源自先民原始宗教活动的《乐经》，今已失传，致使古代先民之礼乐文化资料残缺，此乃中华文明的一大损失。盖《乐经》当为巫祝之歌舞、乐器、气法、咒术、吟唱、宣泄、仿声、表情之理论著述，传说西王母善啸，师旷、驹衍奏乐可使天地为之感应。然《乐经》之旨，要在一个“和”字，这种“和谐”的要旨已被《道德经》和《论语》所继承。《道德经》乃道学文化的元典，《论语》乃儒学文化的元典。所谓元典，是凝聚着中华民族某一领域原创性思维的典籍。在中华文明史上，近二千多年来影响社会人心最大的书有三本，即《易经》、《道德经》、《论语》。诸子百家之学皆源于《易》，故易道在国学中的地位，岂可小觑也哉！

《四库提要》云：“易道广大，无所不包。旁及天文、地理、乐律、兵法、韵学、算术，以逮方外之炉火，皆可援《易》以为说。”《周易》包括三大部分，其一是《易经》，乃夏、商、周三代以来太卜之遗法。《史记·太史公自序》说：“余闻之先人曰：‘伏羲至纯厚，作《易》、八卦。’”我国古代史官世代父子相系，而历代史官传说《易》、八卦乃伏羲氏所作，这与《易·系辞》所云“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，仰则观象于天，俯则观法于地，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，近取诸身，远取诸物，于是始作八卦，以通神明之德，以类万物之情”之说相合。其二是《易传》，含《彖》、《象》、《文言》、《说卦》、《序卦》、《杂卦》、《系辞》乃至近年出土的《二三子问》等。《易传》乃是对《易经》的解说，多为战国时儒者所作。其三为《易图》，包括《河图》、《洛书》、《先天图》、《太极图》等，宋人始传出，称得自高道陈抟。清儒重考据，力斥《易图》皆宋人向壁伪造。直到1977年安徽省阜阳县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出土一只“太乙九宫占盘”，盘上不仅刻有《灵枢经·九宫八风篇》的类似易图，还有《河图》、《洛书》刻在小圆盘上，可知《易图》亦古已有之。《易·系辞》云：“《易》与天地准，故能弥纶天地之道。”“与天地相似，故不违。知周乎万物，而道济天下，故不过。旁行而不流，乐天知命，故不忧。安土敦乎仁，故能爱。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，曲成万物而不遗，通乎昼夜之道而知，故神无方而易无体。”盖中国的古人，首先发现宇宙万事万物都处于变易不居的发展状态之中，于是力图寻找自然世界、社会世界、心灵世界演变的总规律，以达到

预知“幽明之故”，“知死生之说”，“知鬼神之情状”，以选择自己在纷纭变易中的最佳位置。这个“变易”中相对“不易”的总规律，一为以“义理”表述的易道，一为以“象数”表示的形式系统，它们都是“简易”不繁的真、善、美之“道”。西方的现代科学和哲学都受益于形式化系统的逻辑推理，相比之下西方学者常常诟病东方文化缺少形式化的素质。其实《周易》就是中华文明形式化的分支，因之易道被用作中国一切古代科学和哲学普适的框架，称之为“易道广大，无所不包”，当不为过。

自《周易》问世三千年来，历经秦、汉、魏、晋、唐、宋、明、清等朝代，研究易道的著述层出不穷，这些易学家的著作集中了中华民族一代代精英的智慧，因之易道便成了智慧之学。这些历代易学家探索的目标是什么？那就是从“义理”或“象数”两条途径寻找宇宙中这种“变易”、“不易”、“简易”的总规律。盖人类的思维有两个层次，一曰“理性思维”，二曰“灵性思维”。西方哲学偏重理性思维，中国哲学则偏重灵性思维，《周易》显然就是古代先哲灵性思维的结晶。何以判定历代易学家之易道著述学术水平的高低优劣？关键就是看其能否以灵性思维来解读易道。在西方，希尔伯特曾经有一个宏伟的目标，他认为一旦形式系统的公理和逻辑推理的程序给定，宇宙中的总规律就会最终被推导出来。哥德尔不完全定理揭示出形式化逻辑推理的局限性，使希尔伯特的雄伟宏图化为泡影。单靠理性思维无法认知绝对真理，在这方面《周易》的灵性思维更能体现人类的智慧。

近半个世纪以来易道的研究著述良莠不齐，有藉《易经》辞句考据古史者，有用易道典故分析阶级压迫者，有以科学主义观点批判其封建迷信者，有借西方哲学模式讨论其中之辩证法者，有望文生义独标新说解经解传者，更有判定《周易》为哲学书、科学书、管理学书、天文学书或数学书者，不一而足。在近世研习易道的学者中，有三位并非声名显赫的易学家特别引起我的注意。一是台湾的程石泉教授，他对《周易》义理的研究独辟蹊径。二是上海的潘雨廷教授，他对《周易》象数的研究颇具功力，曾得到先师王明教授的赞许。三是重庆的霍斐然先生，曾和先师张义尚先生作忘年交，他对易道和术数学的研究可谓超迈古人。此三位学者之与众不同者，盖因其在研习易道中开启了自己的灵性思维之故。霍斐然先生幼而好易，自号探玄子，穷象数，究易理近六十载，于道学诸家术数之学无所不窥，独得大易《系辞传》、《说卦传》之正解，创《小成图》占法，成一家言。易道乃“探赜索隐、钩深致远”、“穷神知化”、“极深而研几”之学，非引经摘句困于书斋之辈所能学，此所谓“苟非其人，道不虚行”。20世纪90年代余编撰《中华道教大辞典》并著《道教志》，曾将道教中传承的各家术数推演一遍，发现除《奇门遁甲》、《四柱推命》、《文王课》、《梅花易数》等传统算法而外，惟以《大六壬金口诀》及霍斐然先生所创《小成图》占法最切实用，于是在《道学通论·中国术数学》中特作评介。大易无象外之辞，凡研习《周易》而不懂象数，不能以上千个卦例而“玩其占”者，皆不足以谈易。余憾于当世学者借《荀子·大略》“善为易者不占”一句自欺欺人而轻视术数，遂于辛巳年秋亲赴重庆访霍斐然先生求教《小成图》占法，以为《小成图》占法最得易道之精要。霍斐然先生精于太乙、六壬、遁甲三式之学，早年曾以易理揭开刘伯温《烧饼歌》之谜，且以奇门遁甲释《黄帝阴符经》之秘，在当世易学界无人能出其右，故深为余所推重。霍斐然先生辛巳古稀寿诞，余亦有贺诗云：“七十垂钓意如何，学究天人感慨多。玩易犹俟太公望，维新旧邦居奇谋！”

霍斐然先生研习《道德经》和内丹学已有多年，和余结为道友，常有书信往还。近年知他又用尽心力作《周易正解》，盼先睹为快。今霍斐然先生书成，问序于余，余略赘数语以向读者推荐。书中微妙之处，读者自能领略，此之谓“飞龙在天，利见大人”也。

胡孚琛

识于中国社会科学院

2006年6月4日